

中国革命

与中国文学

陶东风 / 主编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和宰制可谓无所不在，无远弗届，这种影响和宰制不仅仅表现为革命和文学的结合产生了“革命文学”这个特殊的文学品种，更表现为，在塑造20世纪中国作家想象世界、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的诸多力量中，革命无疑是最强大、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文学必将完全是另一种面貌。革命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成为理解和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 李 珊 封面设计 / 张涛

ISBN 978-7-207-08109-4



9 787207 081094 >

定价：36.00元

陶东风/主编

中国革命 与中国文学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Literatur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陶东风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07-08109-4

I. 中... II. 陶... III. ①革命史—中国—文集
②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1-53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654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封面设计:张 涛

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

Zhongguogeming Yu Zhongguowenxue

主 编:陶东风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发行电话:(0451)82329930 (0451)82317541

电子邮件:hljrmcbs@yeah.net

网 址:www.longpress.com

印 刷: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80 000

版 次: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7-08109-4/D·1059

定 价:36.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导论 世纪之交话革命

2007年10月26—29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中国北京烟湖国际康体俱乐部举办了“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海内外学者共60余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瑞士、新西兰和中国内地等。大会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会议时间虽短,但经过与会代表广泛热烈的讨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在与会代表的大力支持下,研讨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开得相当成功并收获了一批高质量的会议论文。本文集就是对那次会议论文进行选择、加工和修改的产物。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和宰制可谓无所不在、无远弗届,这种影响和宰制不仅仅表现为革命和文学的结合产生了“革命文学”这个特殊的文学品种,更表现为,在塑造20世纪中国作家想象世界、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的诸多力量中,革命无疑是最强大、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文学必将完全是另一种面貌。革命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成为理解和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自20世纪初起,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热切注意和讨论。在经过上世纪后期一段告别革命、淡化革命的思潮后,近几年,革命和文学这一命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烟湖会议就是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这个主题进行的一次深入集中的探讨和挖掘。

20世纪的100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动荡的100年,要理解这100年,我们不能不借助于一系列关键词,诸如:革命、现代(化)、传统、科学、理性、西学、民主、自由,等等,而“革命”则是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革命意味着政治、经济、

文化的巨大、激进、常常借助于暴力的变革。20世纪最著名的革命家毛泽东有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整整半个多世纪，几乎所有中国人民都卷入了这个“暴烈的行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或为之讴歌，为之献身，为之彪炳千古，或为之家破人亡，为之长歌当哭。

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革命实践必然生产出数量惊人的革命话语和革命言说。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大半个时期，革命话语的不容置疑的宰制性和权威性使得关于革命的言说变得僵化单一，成为高度一元化的霸权话语。“革命”和“反革命”成为划分人的基本标签。在革命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候，反思革命成为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到了20世纪后期，被革命折腾了大半个世纪的国人（他们一开始是闹革命，最后却是被革命闹）几乎一边倒地加入了“反革命”行列。厌倦了急风暴雨的社会动荡，人们开始向往和风细雨的日常生活，开始关注米袋子和菜篮子，“过日子”的哲学一时间取代了斗争哲学。市场拜物教取代了革命拜物教。在一片“告别革命”的呼喊中，关于革命的言说出现了另一种简单化和一元化倾向：革命是魔鬼，是倒行逆施，是罪魁祸首，是一场误会，是上帝和中国人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世纪之交，风向又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新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市场拜物教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面前断了香火，全球化浪潮在进一步推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世界性扩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回潮，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在激励人们的感官享受、极大地消解人们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诉求的同时，又时不时地捡起一些革命文化的碎片（如毛泽东语录、格瓦拉故事）为醉生梦死的衰竭神经注入一丝暧昧的激动——以消费革命的方式重温革命。这个时候，人们发现革命不再是一个那么容易言说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对象。事实证明，“告别革命”和“重上井冈山”（重新革命）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告别革命”么？告别什么样的革命？以民主自由为承诺的革命还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如果是前者，那么，革命的理想显然没有实现，没有实现怎么告别？革命的社会土壤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告别得了么？“重上井冈山”也同样幼稚得可以。什么样的井冈山？一片黄土几间瓦房的井冈山？一贫如洗的井冈山？还是被消费文化装扮得灯红酒绿的今日“井冈山”？多少人

真的舍得放弃灯红酒绿的都市和纸醉金迷的消费文化去打游击、闹革命？或者，这样的闹革命最后会不会演变成《甲方乙方》中那个豪富的闹剧？

但不能否定，“告别革命”和“重上井冈山”之间的这种暧昧状态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反思革命的有利视角。告别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极端立场，我们已经可以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距离，把革命作为一段历史（虽然并不遥远）加以关照（虽然难以完全客观中立）。相对而言，我们有了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研究心态，可以避免成为冷血的古董和狂热的愤青。我们必须承担起反思这一段历史的责任，对它作出认真、理性的研究和总结。

本次会议和本论文集都是这样一种理性反思的产物。

本次大会学术气氛甚浓，进行大会发言的有40余人，他们围绕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这个主题，主要按照六个分论题进行了深入集中的探讨和挖掘。这六个论题基本上涵盖了当代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1. 革命、文学、革命文学

在第一场以“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为主题的发言中，代表们的发言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中国革命的内涵的界定以及革命话语、革命叙事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怡教授从关键词梳理的角度对“革命”和“民族”这两个词及其复杂关系进行了跨文化的谱系学考辨，指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一系列关键词，包括革命，都来自东邻日本，其中，“民族”与“革命”就是两个极为重要又相互关联的词语。他们所理解的“民族”就不再是一个含混笼统的中华的整体，而是能够真正唤起他们生命热情、能够凝聚起他们精神力量、能够令他们自觉献身的崇高理想之物；从民族主义走向对现政权的“革命”，则可以说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追求的必然结果。^①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从五四文学革命到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的发展，一直被描述为一种线性进化的文学进程。随着后革命时代的来临，这种描述模式特别是它所隐含的价值判断在80年代以降遭到了质疑。祁志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与1922年至1936年期间革命作家、左翼作家倡导

^① 参见本书李怡《“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语言与思想背景之一》。

的“革命文学”同属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在活动主体、大众方向、白话形式诸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在深层的价值取向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质的变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从人的文学到普罗文学、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从自由创作到遵命文学、从艺术自律论到政治工具论等等，就是这些变异的具体表现。这种转变，奠定了后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形态的价值取向，直到1978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才发生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按照五四文学（即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的轨迹去重新认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在革命文学历史中影响甚大的概念，河南大学张清民教授从权力—话语的角度，分析了这个概念在文学话语领域的发展过程所表现的概念增补性质，其增补过程表现为话语权力解释、争夺的过程。在增补过程中，使用这一概念的左翼文学家通过话语控制原则，成功地排斥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概念，再加上政治权力的介入，它最终成为权力话语的一个范畴，其作用主要是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再是履行文学或审美的功能。

2. 革命与女性

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使命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前关于革命和妇女的经典叙事中，从来没有怀疑过革命是妇女的解放者，妇女的大救星。但是，随着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革命之于女性解放的局限性，特别是革命对于女性性别的遮蔽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它也获得了本次与会代表、特别是女性代表的高度关注。在“革命—女性—身体”这个主题发言中，各位代表表述了他们对女性、身体与革命关系的思考。

总体来看，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学者一般特别关注女性在革命中的被动处境，关注革命话语内蕴之男权中心主义本质。女性与革命呈现为一种既相依存，又相冲突的复杂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杨联芬教授的《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一文聚焦于1927年大革命时期谢冰莹、白薇、茅盾和叶紫的创作，对大革命中的性别关系与女性体验，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的考察与阐释，指出了女性解放的悖论：当女性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能力时，

革命或不革命,她都无从掌握自己命运,也无从改变其屈从的地位。

女性作家和批评家相比于男性作家对于文学中的身体话语显得特别敏感,她们对于革命和女性的关系的考察常常通过身体这个轴心展开。旅美华裔学者、美国丹佛大学的李力(Li Li Peters)博士在发言中指出,自晚清以降,以女性身体为主导的叙述为主流文学家们提供了想象和创造民族、国家及革命的意义舞台,而女性主体意识本身却大多被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话语系统所忽略、压抑、颠覆,甚至取代。她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主流知识分子对妇女身体意义的书写与重写,如对女子放足的争论、鲁迅和张天翼对女性身体的调度等,力图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了众多的女性,但主要不是为了弘扬她们自身区别于男性的意识、体验、价值和诉求,而是因为她们的身體和社会地位常被用作男性知识分子创造各种各样意义的符号、象征和能指。中国近代改革家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持续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他们对女性作为另一种性别的兴趣,而是因为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的各种表述有利于他们构建民族国家和革命的主流话语结构。因此,在不同阶段以男性为主要作者的对民族革命话语的持续构建过程中,女性的生存境况,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总是呈现为一种不断地被创建和修改的能指,一种被诠释和再诠释的政治修辞,一种不断地被讲述和重新讲述的故事。不少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强调,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得助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只看到民族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提携”与“赞助”,而忽略了批判性地考察以男性占绝对主导的民族主义革命的主导话语究竟是怎样通过替女性代言来“占用”或“篡改”了不少本应属于女性的话语空间,因此不能完全地了解中国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质。^①

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维克多·宇乐(Victor Vuilleumier)博士则通过考察中国现代诗歌中对身体的描写,展现出身体的撕裂、变形及其与灵魂和革命的关系,揭示新诗如何从抒情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以及如何传达出语言、主体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革命美学。

相比之下,来自澳大利亚的罗斯玛丽·罗伯特(R·Roberts)博士的论文对样板戏中的女英雄的谈论不那么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她详细分析了“文革”时期八大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形象,把这些非常时期的女主角置于中国传统女英雄

^① 参见本书李力的论文《在女性的身体上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政治》。

形象的源流中加以比较和梳理,通过详尽的个案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她们既从属于中国传统对理想女性的界定,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之形成了偏离。文章指出,迄今为止,对中国女英雄的研究倾向于关注木兰这样的传统人物,而对样板戏女主角的研究则倾向于将她们看作与中国传统脱轨的“毛文化”产物。她的文章则努力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历史中的女英雄传统中研究样板戏女主角,以求填补这两种立场之间的裂痕。本文试图为界定历史记载和文学传统中的女英雄角色建立一种文化标准,然后对照这些标准“阅读”样板戏女主角,思考她们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或挑战了传统的范畴。在以木兰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女英雄的故事中,女英雄角色是社会政治混乱的象征,而回到传统女性角色则标志了社会政治秩序的恢复。在传统图式中,女英雄的结局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回到传统女性角色,或者死去。本文通过对样板戏女主角(包括喜儿、常宝、柯湘、吴清华、方海珍和江水英等)的个案研究以及观众接受心理的分析,指出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人们对样板戏女主角的接受也与他们传统女英雄典型的认同有关,这表明“革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仍然有着较高的连续性。^①

革命、身体和女性主义的话题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论和深入挖掘,使会议达到了一个高潮。

3.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

作为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十七年文学曾经由于其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获得了极高的推崇,而到了反思革命的新时期又被贬得很低。随着时局的变迁,对它们的评价成为文学史中的重要话题。在“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这个主题讨论单元,各位学者对十七年文学以及相关的战争叙述、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对其带来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倾向是反思、否定甚至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本次会议的与会者却一致认为,不能对十七年文学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何永康教授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不可以把文学现象还原为简单的概念。“十七年文学”,有别于“延安文学”,也不同于“文革文学”,情况相当复杂,其经验和教训有着特殊的深刻性,让人觉得“左”、“右”为难。

^① 参见本书罗斯玛丽·罗伯特《从历史文化视角看样板戏中的中国女英雄》。

他对80年代启蒙叙事把十七年文学“逐出文学史”的做法表示了质疑,同时也承认无论“文革”政治还是“文革”文学,都与十七年政治、“十七年文学”存在某种关联,因此竭力维护十七年文学的“正宗”,不能清醒地面对“十七年”的诸多问题也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去直面它,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要在批判中体察,在体察中批判,尽可能地进入前人的情境和心态,通情达理地审视前人的错误和挫折。作者特别指出,要怀抱“理解”的心态去剖视“十七年文学”所处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势,客观看待和尊重当时某些“错误政策”产生的背景,不能过度地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能“高瞻远瞩”,写出批判“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作品。客观上说,当时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间断地兴风作浪使当时的政治决策者基本上持续了战争岁月的“战争思维”,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许多问题和失误由此而生。但它决不同于“文革”期间“四人帮”的阴谋政治。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就会懂得不要以简单化的态度嘲弄和否定“十七年”间绝大多数作家所怀有那种革命激情,那种纯真的创作心态。^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董之林以赵树理小说为例,对80年代的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叙述进行了质疑,并在当代后现代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市场的语境中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作出了反思。她指出,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革命对于文学以及历史阐释的影响,形成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纠结。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一些学者接受了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文章以赵树理小说为例重新反思了这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阐释了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文学形态,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的多元艺术取向。^②

在十七年文学中,有关革命战争的描写占有突出地位。席扬(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指出,解放后的新政治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也要求支撑这种合法性的历史叙述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应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在革命视野中,虽然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的过程,但是,革

① 参见本书何永康的文章《评价“十七年文学”应持科学态度》。

② 参见本书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

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一定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的限制,只要战争的描写最终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就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①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身份一直是十分暧昧尴尬的。他们被认为是摇摆不定的浮游阶层(需要附在“皮”上的“毛”),前进一步可以成为革命者或者革命的同路人,退后一步则堕入“反革命”。这就直接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在革命文学中处于十分敏感和尴尬的地位。《青春之歌》艰难的写作、修改命运,以及它引发的大讨论,戏剧性地说明了这一点。河南大学文学院孙先科教授以“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分析对象,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取得的伟大成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人民”还是“敌人”,取决于他们或左或右的选择。与此相应,在革命“创世纪”(“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文化想象与象征格局中,共产党是“创世”英雄,那些得以忝列革命队伍的“人民”则是追慕与模仿英雄的人;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是这一世界中邪恶的魔鬼;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两面性——有革命倾向同时又软弱动摇,成为“神话家族”中最为变动不居的一群。这一群体会剧烈分化,一部分走向革命,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追慕英雄而成长;另一部分则成为形形色色的堕落者、帮凶甚至是魔鬼。^②

4. 革命、现代性、民族性

中国革命是在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的独特语境中发生和展开的,有人称之为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也有人表述为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联系与紧张。两者既密切相关也时有龃龉。一方面,启蒙(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救亡(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启蒙语境中,西方文化和文明被普遍理解为现代的先进文化,而在救亡的语境中,西方又成为必须赶走的“列强”,两者关系之紧张和微妙就难以避免。处理现代化诉求和民族化诉求的紧张和悖论,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而棘手的重大课题。在“现代性·民族性·革命”这个主题发言中,各位教授从不同角度涉及了

^① 参见本书席杨《“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十七年”抗战小说叙事与修辞初论》。

^② 参见本书孙先科《“革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及其“成长”——“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这个问题。比如武汉大学文学院陈国恩教授从分析革命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说明了左翼文学的产生与得失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从而为思考文学与社会和人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现代性诉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从梁启超率先提出“革命”的概念开始,现代性的想象就与革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它所遗留的问题导致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启蒙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与革命现代性一致的,但在实施的方案和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了尴尬的处境,从而被一种新的革命现代性所取代。新的革命现代性规范了左翼文学,在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左翼文学话语的内在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理论形态处于动态平衡中;它的文学形态在艺术成就上参差不齐,其中优秀的部分代表了一种追求文学的政治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努力。在世俗化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含混的当下,左翼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民族正义想象、社会公正追求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理念等,可以作为一种遗产被合理地吸收和借鉴。^①

吴泽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综合运用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指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晚清知识分子在全球视野中发现了文学的民族性。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导致了中国人传统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文学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事业,变成一时一地一国一族的政教资产。文学民族性的发现,更让中国人得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出发,以外来文学作比照,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文学民族性的发现,也导致了西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论。^②

石凤珍(大同大学文学院)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民族主义转向,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在抗战时期作出了由国际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战略决策。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转变促使文化亦有一个相应的民族主义转向。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相结合、发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号召,标志着共产党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国化”与“民族化”文化主张和指

① 参见本书陈国恩《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② 参见本书吴泽泉《全球视野中文学民族性的发现——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

导思想的正式确立,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①

5. 后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

随着“告别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流行,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所谓“后革命时代”。革命已成为历史、成为人们的记忆和表述的对象。在这种语境下,红太阳热、红色经典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考察则是透视有关“革命”的历史、话语和作品的当下境遇的一个重要角度。在“红色经典·后革命”这个主题单元中,各位代表对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市场化时代对革命的道想与质询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陶东风教授其专题报告中对“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区分了后革命书写的三个阶段以及相应的三种基本书写类型。第一种出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所谓“新启蒙”时期,这个阶段的后革命书写可以称之为“历史修复主义”,在类型上属于对革命的人性化书写,其核心是赋予革命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维度以便修复、而不是彻底否定革命叙事;第二种出现在80年代后期的革命幻灭阶段,在类型上属于解构式书写,其特点是把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当作革命的动力,以轮回、循环的观念代替进步、进化的概念,以家族复仇叙事取代阶级斗争叙事,属于对革命的倒退式书写;第三个阶段是犬儒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阶段,其类型属于对革命的调侃、戏谑式书写,戏说革命是其基本特征。^②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着眼于当下的一个媒体事件,探讨了红色经典在当下消费热潮中遭遇亚文化改编的境遇,以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交锋和收编关系。他指出,“红色经典”经过大众文化的商业命名和主流文化的重新确认之后获得了一种合法性和政治正确性,却因此穿越了价值判断的防线而变成了一种“保护措施”。“恶搞”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不经意间打破了这种“保护”格局,同时还使主流文化陷入一种扑空的尴尬。因此,可以把红色经典被恶搞看作是红色经典在“去博物馆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必然遭遇。在当下的格局中,可能只有通过对话,才有助于消除文化样式之间的紧张关系。^③

除了上述归纳的这些相对集中的主题以外,还有不少难以归入这些主题但同样精彩的发言和论文。比如厦门大学中文系王焯教授长期从事革命小说叙

① 参见本书石凤珍《民族抗战影响下的文化(文艺)民族主义转向》。

② 参见本书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

③ 参见本书赵勇的论文《当红色经典遭遇恶搞——对一起媒介事件的文化分析》。

事模式的研究,本次提交的论文《20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类型及逻辑形态》将20年代的革命小说分为四种叙事模式,即反抗叙事、成长叙事、焦虑叙事、英雄传奇叙事,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逻辑形态及其表现出的20年代意识形态的想象方式。反抗叙事以劳动者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表现有产者的罪恶,构成善/恶冲突的语义结构。成长叙事以受压迫的青年成长为革命者的精神变化,构成寻找/革命的语义结构。焦虑叙事以革命者个人与革命的心理冲突,构成焦虑/克服的语义结构。英雄传奇叙事以革命英雄斗争及流亡的过程,构成革命/禁止的语义结构。它们分别属于价值(善,恶)、真假(可能性,不可能性)、认识(知识,无知)与义务(责任,禁止)的逻辑形态,呈现了20年代革命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想象方式,实践着为革命宣传、推动革命情绪高涨的革命文学责任。^①

对革命的理性的反思态度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只有在后革命时代,革命才能够成为理性反思的对象。不研究革命就无法认识20世纪的中国,当然也无法认识当下的中国,因为当下中国不可能不背负着革命的遗产向前发展。

本次会议期间,我的研究生杨玲、李建磊、张淳、刘晓鑫等为会务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杨玲和李建磊还参与了论文集的编辑整理。我对他们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陶东风

2008年6月22日于北京

^① 参见本书王焯的论文《20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类型及逻辑形态》。

目 录

- 导论 世纪之交话革命 陶东风/1
- “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语言与思想背景之一 李 怡/1
-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 祁志祥/11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个文学概念的权力话语分析
张清民 李建立/24
- 女性与革命
——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 杨联芬/31
- 在女性的身体上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政治 李 力/44
- 从历史文化视角看样板戏中的中国女英雄 罗斯玛丽·罗伯特/64
- 灵魂、身体与革命：中国现代诗歌中身体的矛盾转化
维克多·宇乐/81

- 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陈国恩/101
- 新的小说的诞生?
——丁玲小说《水》与左翼文学规范的关系 逢增玉/113
- 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 董之林/126
- 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十七年文学 何永康/142
- “革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及其“成长”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孙先科/152
- 国家话语与民间立场:赵树理在革命文学中的境遇 和 磊/166
- “九一八”戏剧文学的发生及意义 刘瑞弘/176
- 民族抗战影响下的文化(文艺)民族主义转向 石凤珍/185
- 全球视野中文学民族性的发现
——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 吴泽泉/196
- 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陶东风/210
- 当红色经典遭遇恶搞
——对一起媒介事件的文化分析 赵 勇/226
- 20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类型及逻辑形态 王 烨/238
- 中国当代文学的英雄形象塑造与意识形态 朱水涌/250
- 样板戏
——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 杨春时/253